

• Academic Yearly •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外语教育

Vol. 10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10

• Academic Yearly •

外语教育

Vol. 10

2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语教育 Vol.10/秦晓晴 主编.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609-7025-7

I. 外… II. 秦… III. 外语教学-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H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6179 号

外语教育 Vol.10

秦晓晴 主编

策划编辑:梅欣君 E-mail:mxj.8@163.com

责任编辑:殷茵

责任校对:朱玢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57437

录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5.5

字数:368千字

版次: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32.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刊 首 语

弹指一挥间,《外语教育》自创刊以来,迄今已经历了10个春秋的磨砺。在过去的10年中,《外语教育》始终秉承繁荣外语界学术研究、展示外语教育成果、发现并推介新人的宗旨,以促进我国外语学科的发展、扩大学术交流范围为己任。在这不平凡的10年间,在众多学术专家、论文作者和编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其质量正日渐上升,成为我国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展示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

本卷《外语教育》继续沿用了第9卷的内容框架,共设置了六个专栏:专家特稿专栏、外国语言及语言理论专栏、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专栏、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专栏、翻译理论与实践专栏,以及外国文学研究专栏。本期专家特稿专栏刊发了潘文国教授的论文《关于中国文化遗产与传播的思考》及卫乃兴教授的论文《共选与外语教学》。其中潘教授认为中国文化的对内传承和对外传播是当前一个热点,并就传承传播的迫切性、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以及如何进行传承传播三个主题,从十二个方面进行了思考。文章指出,传承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应是政府行为;其首要对象不是儿童,而应是大人,特别是各级管理人员,且传承的核心就是“修身”;“六经皆史”是一种朝后看的态度,“六经皆器”是一种朝前看的态度,而我们今天的传承和传播归根到底是为了朝前看;要重新认识自己,区别“精华糟粕”;文化知识的海外传播一定要考虑到对象、内容和方式,可以各种方式进行,但必须时时关注到背后的“道”。卫教授的论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指出语言使用中共选关系的意义所在。交际过程中的三种共选关系分别为词汇与语法的共选、词汇与词汇的共选、形式与意义的共选。第二部分谈短语学单位在共选理论框架下的工作定义与工作方法。第三部分重点谈词汇的敏感的语义环境。第四部分谈翻译研究中的假朋友问题。第五部分用共选理论来观察、分析、诊断学习者在介语中出现的问题。最后指出词汇与语法是非常精密地组织在一起的,表现为很多形式和各种各样的短语单位。这些重要的意义单位具有重要的研究和教学价值。每一个词汇对处于它语境中的个别的词汇都是高度敏感的。它的典型的搭配和典型的形式指向语言的地道性。每一位语言教师和语言学习者都应该高度关注语言的共选关系。

在外国语言及语言理论专栏中,学者们的论文涉及面较广,包括从系统功能语法看文体特征、高校大众文化层面探究、当代日本祈使性表达研究、中日色彩意识承载的文化内涵等多方面的话题。

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专栏中的稿件涉及词汇习得、听力教学、俄罗斯民族文化课程开设、影视课教学等诸多方面。

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专栏刊发了有关大学英语教师评分者偏差的多层面 Rasch 模型分析的文章。

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专栏中刊发的论文分析了读者反应论、多元系统理论、翻译与文学的关系,并以此为引导,对具体作品的翻译策略进行了探究。

外国文学研究专栏刊载了对席勒笔下的“异国美女”的形象分析,对安·波特小说中人物角色、写作技巧的解析,从东方主义、解构主义角度分析《蝴蝶君》并得出相关结论的论文。另外,本刊还发表了蒋坚霞教授《评莎剧〈哈姆莱特〉中一段独白的四种权威汉译》一文,献给读者,作为对莎翁写作《哈姆莱特》距今 410 周年的纪念。

本卷《外语教育》所刊载的不少文章将理论、学说、研究、教学融会贯通,宏观论述与微观解析相结合,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本刊自 2007 年成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网络出版总库收录刊物以来,所刊发的论文检索量逐年增加。2009 年本刊还被纳入该库高端文献检测系统(AMLC),以鼓励原创性研究,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在此,我们期待外语教育的专家学者们不吝赐稿,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外语教育》,共同繁荣我国的外语教育事业。

《外语教育》编审委员会

2010 年 12 月

外语教育
Academic Yearly
Vol. 10

封面题字 赵世开

主 编 秦晓晴

副 主 编 樊 葳 葳
陈俊森
胡 泓
杨文秀

编审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应杰 许明武
张开平 杨文秀
陈俊森 周江林
胡 泓 秦晓晴
徐锦芬 黄 勤
樊葳葳

编 务 余 敏

目 录

专家特稿

关于中国文化遗产与传播的思考 潘文国(1)
共选与外语教学 卫乃兴(17)

外国语言及语言理论

系统功能语法视角下的生物医学研究性论文摘要

的文体特征 敖晓梅(21)
高校大众文化三层面表现探究 马玉龙 樊葳葳(28)
当代日本祈使性表达研究 陈慧玲(34)
中日色彩意识承载的文化内涵
——以“红色”、“白色”为中心 ... 刘梦晶 王秋华(42)
浅析中文电影中方言的英文配音
——以电影《花样年华》英文配音为例
..... 计秀明 胡志清(49)

“Big+N”与“Small+N”不对称性原因分析

..... 于红 戴卫平(56)

法语同义词多角分析 丘晓娟(60)

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新探:复杂系统的视角

..... 魏大为 武和平(67)

九寨沟景点简介和导游词的及物性对比分析

..... 徐志华 曾波(74)

习语的语义特征及分类界定 叶琳 杨遗旗(79)

关于2010年舟曲泥石流英语新闻的批评性语篇分析

..... 龚群 黄勤(84)

大学生英语作文中的衔接和连贯错误 艾媛(89)

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

影响词汇习得的语言学表征研究述评

..... 金晓兵 苏崇婷(95)

日语专业学生听力困难因素分析 安静 王秋华(101)

论“俄罗斯民族文化”课程的开设

——中国“俄罗斯学”在公选课领域中的一次实践

..... 陈欢云(110)

浅析非英语专业影视英语选修课程在自主学习

时代的定位 郝苗(117)

“软实力”视角下的跨文化交际教学 康莉(121)

艺术类学生学习动机调查及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 马兰芳(127)

从认知语用学角度看英语课堂会话中的师生沉默

..... 郭坤 田成泉(134)

英语词汇习得中的理据策略研究 杨红燕(139)

论综合英语教学与翻译能力的培养

——一项对英语专业基础阶段综合英语教学实施对比性教学的跟踪调查与分析

..... 张永花 吴颖 蔡慧娟 廖红燕 张昀(143)

论法律英语的特点与法律英语教学 杜朝明(149)

二语/外语习得中的语境猜词动因论

——从语言使用到语言教学 刘炜(153)

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

大学英语教师评分者偏差的多层面 Rasch 模型分析

..... 黄玮莹(162)

基于学习者语料库的开放式 CALL 软件开发

——以英语作文错误反馈软件的构建为例

..... 李慷 董元兴 刘芳(170)

翻译理论与实践

从读者反应论的角度对比赏析《野草》两英译本

..... 熊瑶(176)

从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看茅盾文学翻译对其早期

文学创作的影响 姚金艳(181)

多元系统理论下《草叶集》两译本多维对比分析

..... 赵玉 胡志清(186)

外国文学研究

席勒笔下的“异国美女”形象探析 谭渊(193)

是“同性恋”还是“文化颠覆”?

——《蝴蝶君》主人公及作者解析 王正胜(201)

与命运抗争的女人们

——读安·波波小说 王茹(207)

图形/背景的现实化

——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探析 ... 张再红(211)

评莎剧《哈姆莱特》中一段独白的四种权威汉译

..... 蒋坚霞(217)

论法华精神在《银河铁道之夜》中的体现

——从柯贝内拉之死说开来 甘涛 李静(233)

外语教育

Academic Yearly

Vol. 10

主办: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
大学科技大楼北楼 712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43839

027-87543239

传真:027-87543139

E-mail:

wyjj@mail.hust.edu.cn

出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关于中国文化传播与传播的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 潘文国

摘要:中国文化的对内传承和对外传播是当前一个热点,本文就传承传播的迫切性、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以及如何进行传承传播三个主题,从十二个方面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传统文化;传承;传播

Abstract:To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o spread it in the world has become a deep concern of our time. Around three themes of WHY, WHAT and HOW,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from 12 points.

Key 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arrying forward the tradition; spreading the culture in the world

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大好形势下,中国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曾经被弃如敝屣的传统文化突然变得炙手可热,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国内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国学热”,传播中国文化也成了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热门话题。中国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可以说正处在历史上一个最好的时期,但它也可能处在一个最困难的时期。机遇和危机并存。历史给了中华文化一个最好的在国内绽放、在国际传播的机会,但能否抓住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形势不容乐观。一些有识之士还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深深的忧虑。忧虑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传承传播中国文化的紧迫性和意义究竟何在?第二,什么是值得传承和传播的传统文化的精神?第三,应该怎样传承和传播中国文化?本文想就这三个方面,提出若干问题进行思考。

1. 传承传播中国文化的紧迫性

在传承传播中国文化的紧迫性方面,需

要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1.1 紧迫性体现在哪里?

说传承传播中华文化现在是一个关键时期,这是因为机会稍纵即逝,很可能再过一二十年,这个机会就将飘逝而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文化得到重视的背景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过仅仅30年的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这不得不使世界其他国家刮目相看,迫切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奇迹”背后的因素,文化问题才浮出水面。类似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也曾经引起过世界的关注,甚至兴起了一股“儒学热”。但在“亚洲四小龙”的光环褪色以后儒学热也迅速成了明日黄花。今天的情况从某种角度看跟当时其实差不多。但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经济的高速发展不可能永远持续,美、日、欧、中等世界各大经济体的位置经常在变化,俄罗斯、印度、巴西等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也正在虎视眈眈,20年后执掌世界经济牛耳的还不知是谁。

^{*} 本文系潘文国教授于2010年5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所作讲座的讲稿,承蒙其赐稿才得以在本书刊载,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经济是皮，文化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要以为人们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感起了兴趣，经济退了烧，文化必然降温，那时传播中国文化的日子就没有现在这么好过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拯救世界，这只是一个世纪来以罗素为代表的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多数中国人自己也还未必感受得到。而能不能拯救世界更要靠事实来说话，现在有多少中国人对此有信心？恐怕他们连依靠传统文化解决当今中国自己的社会问题都感到力不从心。历史确实给了中国文化机会，但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紧迫性的另一个方面是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正在老去，懂得原汁原味传统文化的人更可能已是硕果仅存。文化是靠人传承的，没有真正懂文化的人传承就要大打折扣。许多古老的技艺如超薄金箔的打制等已经失传。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可能更是如此。最熟悉传统文化的一代可能是1905年废科举以前的一代，这一代即使还有人健在也都是100岁以上的高龄者了。接下来，五四前出生的人剩下的也已不多。五四以后出生的人由于特殊条件（如出生在相对闭塞的地域、旧式家庭背景、师友传授的因素等），可能还有少数人受过一点比较系统的传统教育，但绝大多数人对传统文化已经不甚了了。直到40年代末都是如此，这批人也正在老去。而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基本上没有直接面对过中国经典，除了读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的人从各自专业角度接触过一些零散片段之外，多数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大约就是中学时从鲁迅小说《狂人日记》里读到的那段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981）因此一听到有人提及传统文化，他们头脑里本能反映出的首先就是这幅画面。70年代以后的

人与传统就更隔膜了。因而如果我们说中国人现在多数不懂得中国文化，可能一点也不夸大。时机真正是时不我待。

还有一些乐观的人说，历史上也曾有过许多时期，由于外敌入侵等因素，中国文化也出现过濒危的状况，但中国文化因其“顽强的生命力”，总能历经磨难，最后“浴火重生”、重新辉煌。但我们必须指出，这个机会今天不会再有。因为两千年来中国尽管经历过各种磨难，但社会的基本形态没变，社会的经济基础没变，这就好比植物，尽管地表上的茎叶花果都被劫火烧去了，但只要地底下的根还在，一有机会便会春风吹又生。而20世纪以来的一系列变革却是伤筋动骨，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思想基础、教育基础都不复存在，作为传统文化根基的、两千年来几乎很少变化过的农村，经过“城市化”之后，再过一二十年可能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另外一种面貌。传统文化将不会再有自动复生的土壤，除非从现在起就有人认真地关注和继承。

1.2 传统文化真的值得继承并发扬吗？

这涉及我们是在什么心态下把传承、传播中国文化提上议事日程的。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认真考虑过，当初我们是为什么、又如何把传统文化弃如敝屣的？今天我们是在什么心态下、又为了什么要重新捡起这件被抛弃的旧衣物的？当初我们抛弃它时，是真的因为它不好，还是只是我们误以为它不好？那么今天要重新捡起它时，是真的认为它原是好东西、只是被人误解了，还是因为突然发现这些“老古董”有“文物”价值，可以拿来换钱？传统文化是真的有价值，还是只是因为有人说它有价值？或者甚至只是因为有些外国人也说它有价值？这些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出口转内销”，明明是自己的东西，但只有当外国人认为有价值时，我

们才会认为有价值。这次是不是又“故态复萌”了呢？提出“中国文化值得不值得继承”这个问题，说明很多人其实并不真懂中国文化的价值，现在跟着起哄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在说好，就好像炒作文物一样，自己也不知从文物市场淘来的是个什么劳什子，只希望到拍卖会上去撞撞大运。如果抱着这种心态去谈传承和传播中国文化，那么，这样的“三分钟热度”很快就会退烧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真正理解继承传统，或者更确切地说，“回到经典”，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价值。事实上，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文明来说，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回到经典”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提出这个命题的其实是德国哲学家、“轴心时代”这个概念的始倡者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他指出，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这段时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古印度的文化几乎同时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出现了各自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则有孔子、老子。这些先哲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且一直影响着直到今天的人类的生活。由于全人类的思想或者说智慧在“轴心时代”已经达到了顶峰，以后无法超越，因而社会发展的思想动力只能来自“回到经典”。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面临新的飞跃的时候，就总会回过头去，从“轴心时代”的先哲们那里寻找智慧。

历史确实可以证明雅斯贝尔的理论。从西方社会发展史上几个重大转折点来看，“文艺复兴”本质上讲是古希腊智慧的重新发现。启蒙运动和西方近代化的动力相当部分来自以理学为代表的东方儒学智慧。西方哲学的每一次进展都可说是从“回到柏拉图”开始的，因此西方哲学家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对柏拉图的重新阐释史。20世

纪以来，西方弥漫着一种“世纪末”(fin de siècle)的感觉，在当代尤其强烈，因此西方学者提出要从古典特别要从东方经典中去寻找出路，这正是“回到经典”在今天的最新体现。中国历史上，社会发展的动力常来自某种“托古改制”，每次大的变革，不论是政治改革如北宋王安石变法或明代张居正新政，还是农民起义引起的改朝换代，其叫出的口号无不是在经典里就已有过的，直到康有为的维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还是如此。中国人爱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革命的理论武器往往来自经典，例如“汤武革命”、“救民于水火”等，可见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回到经典。甚至文学艺术的发展，尽管历代均有大师，但后代未必超过前代。这不能用进化论来解释，却可以用“回到经典”来解释。每一个新的高潮的到来、新的大师的产生，都是从回到经典开始的。如中国的唐宋古文运动、西方古典主义的绘画等。拒绝传统、迷信进化论，是真正的拒绝进步、拒绝发展。只有从这个意义上去看，我们才能了解“传承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现实意义，传承是为了发展，而不是为传承而传承。

1.3 五四情结难割难舍

重回经典还意味着“反‘反传统’”。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彻底的厄运，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重新回到经典，必然会涉及对五四的重新评价。这是一个绕不过去、回避不了、也无法回避的问题。要传承和传播文化，首先当然先要承认传统、正视传统。如果连传统都不承认，怎么谈得上学习和继承呢？说要弘扬和传播，那就更是自欺欺人；如果认为中国文化是个坏东西，却还要起劲地传播到国外去，那不是蓄意去害人吗？涉及对传统文化的评价，五四运动是绕不过去的。这不仅是因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还因为五四思潮对今天还有着随处可见的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有种种可肯定之处,有种种历史功绩,但有一点是必须坚决否定的:它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即把否定传统、辱骂祖宗作为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动力。几千年来,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这样的事只发生在中国^①,只发生在五四前后。之后,这个先例不断被复制,直到“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而登峰造极。更可怕的是,这一思潮至今还在相当一部分人中有着市场。现在年轻人中弥漫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谈到中国古代社会几乎是一片灰色,例如网上有人公然说,“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并不让我感到自豪,反而使我感到蒙羞”!^②这种现象在全世界很难找到,究其源,五四人物不能辞其咎。事实上,鲁迅描写的“吃人”二字其实也适用于西方的古代社会,甚至也适用于今天某些地方,譬如煤老板对矿工的压榨、某些地方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掠夺,不也是“吃人”?但是给五四人物一渲染,就变成这些“吃人”现象只发生在中国历史上似的。近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都产生过崇洋媚外的情绪,但没有像中国这样强烈、持久而且愈演愈烈的,对传统的过分否定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要五四运动还是要传统,已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两难选择:从某种角度看,肯定五四运动就是肯定其对传统的否定,肯定传统就是某种程度的否定五四运动。如果我们既要继承传统,又不想否定五四运动,就必须找出一个两全的解决办法。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题目是无解的。但我认为,解决

这个难题并非不可能。其办法就是严格区分五四精神和五四思潮,对前者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肯定,对后者却必须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实际上,肯定五四精神,不但与继承传统不相抵触,甚至可说它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延续。五四的反帝、爱国精神,它改造社会的良好愿望,本身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体现,是传统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可贵品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现,在精神上,它与东汉太学生的反党锢、明末东林党的反阉竖可说是一脉相承的。这一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而五四人物的具体思想、观点、言论、主张,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影响深远的五四思潮,却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特别是到了今天,经过百年的历史积淀,其积极和消极的后果已表露无遗,我们更有了进行重新评价的基础。总之,破解五四情结,是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找到中国在 21 世纪走向世界的新起点必须要走的一步。区别五四精神和五四思潮,可能是一个最有效的办法。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要肯定五四精神,就不敢重评五四思潮,也不会因为要重评五四思潮,便对五四精神也表现出了怀疑。可以说,到了今天,重评五四已到了一个不容拖延的时刻,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将会越大。

2. 真正理解传统文化精神

在真正理解传统文化精神方面,我们想到的,是下面这些问题。

^① 北大王岳川教授指出:“我从来没有看到西方一流的大思想家如此深恶痛绝地去批判抛弃他们的传统和历史。我没有看到西方大师对古希腊加以全盘抛弃和攻讦式的批判,对古罗马加以颠覆批判和全盘抛弃,对希伯来文化加以情绪化批判和抛弃。相反,我所看到的比比皆是国人对中国传统、中国先秦思想、中国文化艺术精神的批判与抛弃。我没有看到西方人对《圣经》嗤之以鼻的抛弃,相反看到国人对《道德经》、《论语》等进行全盘否定式的批判。”

^② 2010 年 12 月 13 日打开百度,查询“五千年的历史不值得自豪”,查得的网页是 627000 篇,类似这样的言论处处可见。

2.1 “西化”的传统文化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

很多人以为,只要我们讲到古代,讲到传统的事件、人物,甚至提到那些用文言文写的作品,我们就是在讲“传统文化”了。其实并非如此,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传统文化在多数情况下已经不是“传统”的传统文化,而是已经被“西化”了的传统文化,它们反映的往往并非传统文化的原貌。此话怎讲?我们还是要从五四说起。五四是要否定传统文化的,然而近百年来,传统文化还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存在着。只是谁都能看出,今天所看到的传统文化与五四以前的传统文化已经大不一样了。其区别就在于,五四以后,传统文化已经经过了一步步的名为“现代化”、实则“西化”的过程,呈现在眼前的已经不是其原貌了。

五四以来,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称之为打倒阶段,全盘否定,彻底否定,其最激烈的主张是要把古书“全部烧掉”、“扔到茅厕里去”。这些话语都出自一些著名人物之口,影响深广,但这些人后来多数对这些在特殊背景下的话语表示出了后悔,我们这里就不忍心再提他们的名字了。全盘否定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一落千丈,从祭坛上的神主牌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人们避之唯恐不及。

第二阶段可称之为整理阶段。五四以后,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这个主张表面上看是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客观的研究,实质上却是用西方的学术体系去肢解、改造传统中国的学问。其结果是把其中可以纳入西方学术体系的部分一个个分离

和独立出来,建立了西方范式的一个个“学科”: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语法学、词汇学、经济学、逻辑学、政治学、军事学、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而没法纳入西方学术体系的学问就被以“科学”的名义排除在外,在“整理”的过程中被冷落、遗弃,以至于逐渐消亡或者边缘化了,例如“经学”、“子学”、“小学”、“训诂学”、“文章学”等。^①“整理国故”的功绩是建立了中国现代的学科体系,要不然我们真没法想象今天的学术研究如何进行。而其代价却是彻底放弃了中国原有的学术体系,西式体系的建立就是中式体系的瓦解,“传统文化”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它的学理基础。这一过程的功过是个大题目,这里无法评述,但可以指出的是,西方学科体系诚然有许多长处,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也不会一无是处,两者应该说各有短长、各有利弊,强行以一方取代另一方的结果则必定造成另一方的萎缩。因为不同体系的学科架构、术语系统、研究范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例如桐城派主张文章要“义理、考据、辞章”三结合,用今天的学科眼光去分析,“义理”近于哲学,“考据”近于历史学和语言学,“辞章”近于文学,分属于三个或四个学科,主张三结合就是文史哲不分,是传统研究的一大“缺点”。但我们如果从另一面去想,我们把古代的同部文献,例如《庄子》、《史记》、《三国演义》,分别放到文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学科去研究,各说各的一套,而且彼此不相往来,能得到它们的全貌吗?

第三阶段可称之为改造阶段。五四以后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说好听点是“与国际接轨”,说难听点是“跟着转”。由于整个现代中国的学科分类是建立在西方学科体系基础之上的,其结果是学科的理论、方法、

① 要区别这两套学科体系非常容易,前一套学科名称都能够轻松地译成英语或其他西方语言,因为其本来来自西方,而后一套体系即使绞尽脑汁也未必能找到贴切的外语翻译,因为在西方找不到对应物。

概念、术语,乃至争论的议题,无不来自西方。“所有的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哪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是吕叔湘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概括,其实也适合于人文社科多数学科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中国学者在追踪“跟西方接轨”的“现代化”道路上,根本不知传统为何物,所谓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就很少不是跟着西方的理论框架和套路在走。例如哲学研究,就总是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机械论或者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相对主义等概念里打转^①;历史学则是跟在西方理论后面,把两千年丰富的中国历史,归结为“封建主义”一个简单的字眼;文学则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大门类以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等套路里转,以至出现“没写过长篇小说,就不能算文学家”的奇谈怪论,等到西方套路变了,例如兴起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心理分析、后现代主义等,咱们的理论也就跟着转,而古人以及他们的思想、作品也就一次次被套上现代西方的服装。在这种情况下谈传承传统文化,不过是用现代术语对古人进行重新包装而已。研究传统文化本来是要为现实服务的,看古代思想和智慧有哪些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的;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古人成了现代文化的标签,诸如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张岱是个“90后、富二代、官二代”之类。

2.2 “进化论”有色眼镜下的传统文化,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

进化论是19世纪末以来影响中国最深刻、最强烈的文化思潮,直至今天还大有市场。10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之一或者说思想基础之一就是进化论。按照进化论,新的总比旧的好,后起的总比

先前的好,下一代总是胜过上一代。这些带着“进化论”眼镜的人,看问题是以时代甚至以年龄划线的,“传统文化”名称上的“传统”两个字,对他们来说已经意味着立于必败之地,未战先输,甚至一钱不值了。“传统”就是陈旧、落后的代名词,主张回到经典、继承传统当然就是“开历史倒车”。而一戴上“开历史倒车”的罪名,就等于已被判了死刑,连具体审判都可以省去了。在过去的100年里,孔子、老子都曾被戴上过这顶帽子,诸如“没落贵族的代言人”、“要倒退到奴隶社会”等,那样的人、那样的思想,怎么可能会有“进步意义”呢?谈传统文化,满足少数人的怀旧情感,发发思古之幽情是可以的,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却是毫无价值的。传统文化中精华不多,糟粕不少,对现代人来说,更应警惕的是防止其中的糟粕毒害今天的年轻人!如果抱着以上那样的心态,不要说传承传统文化,连承认传统文化事实上也不可能。因此既然提出要传承传统文化,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认真对待,对其理论基础“进化论”,就更不能不从根本上进行反思。2009年是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曾在西方世界引起过一个纪念热,有人对进化论赞不绝口,认为它是100多年来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但也有不少人对进化论持保留态度。我认为在中国背景下,对此更必须非常小心。

按照进化论,后来的一定比早先的好,但我们在人类社会文化历史上实在找不出这样的规律。拿中国历史来说,唐太宗一定比汉武帝好?宋太祖一定比唐太宗好?成吉思汗一定胜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清朝必定是历史上最先进的朝代?更不用说唐诗、宋词、元曲这些“一代之文学”,事实上每种文体在当时达到的总体上的成就,都是后人难以企及的。西方古典主义的音乐、浪漫

^① “朴素的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可能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最高评价了。

主义的绘画等也是如此。实际的情况是,各个时代都有先进有落后、有坏人有坏人,而后代的坏人不会比前代的好人好,很可能是更坏。马克思说“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言下之意就是承认历史可能是循环发展的,这是无法用进化论这种直线式的思维来解释的。“理论”和事实如此不相容,这就迫使我们进化论进行认真考察。从考察的结果发现,现在我们所理解的“进化论”,其实是对达尔文的歪读,对中国人来说,更与错误的翻译有关。达尔文的“theory of evolution”本来是生物学的概念,讲的是物种的演化:物种不是分别独立创造的,而是在已有物种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成的。这一学说是基督教“上帝创世论”的严正批判,其革命性是毋庸置疑的。演化的要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mechanism of natural selection, survival of the fittest)。严复把这一学说译成“天演论”,非常准确地体现了达尔文的这个思想。但不知为什么日本人把它译成了“进化论”,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译法如此轻而易举地取代了严复的“天演论”而在中国流行,所有的误会和曲解便由此而起。必须严肃地指出,这个新译法是不符合达尔文原意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达尔文的书名是“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明明讲的是自然演变过程,favoured或者 the fittest 是“适者”,“适者”是个中性词,它可能是“强者”,但不一定是“优者”。而一翻译成“进化”,便隐含了这个意思,好像“适者”一定是“进步者”,这便导致了认为后起物种肯定比以前高级、优越的观点。事实上,后起物种之得以生存只是由于它适应了新的生存环境而已,在许多方面可能还不如以前的,如狗的嗅觉、老马识途、苍蝇的免疫能力等,就远比所谓最高等动物“人”强得多。按照自然进化论,人是地球上最高等的

生物,而正是人类的活动,现在正在毁灭地球上的其他物种甚至地球本身,在现在条件下最能够幸免灭绝的物种大约是沦为人类“宠物”的那些物种,难道这就是生物“进化”的最终结果吗?第二,把生物学上的理论运用到社会学、人类学、人种学,产生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在某种程度上为19世纪下半叶以后到现在迅速发展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提供了借口。事实上,生物演化论完全不能用到社会上,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简单的后胜于前的一条直线是错误的。西方学者提出的社会进化顺序只是一种假设,并不具有普遍性,那种理论对于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所谓“封建社会”就没有解释力或者只能曲解,我们现在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解很多是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的,是拿西方的社会历史形态来硬套的结果。事实上,即使按照西方的社会发展观,也不能说后起的社会形态在一切方面都胜于以前。例如在生态保护方面,农业社会就远比工业化社会要好得多,关于这点当代的中国人可能最有体会。第三,更重要的是,“演化”是在原来物种基础上的,许多特点代代相传,其中有的特点因为适应环境得到了强化,有的因不适应则慢慢退化。而进化论特别是社会进化论往往回避这种前后相承关系,好像后者是突然产生的,而且一产生就一定优于先前。这既不符合生物学的事实,更不符合社会发展的事实,特别不符合思想发展的事实。前面说过人类历史上曾经有个“轴心时代”,轴心时代贤哲们达到的思想高度为两千年来的后人无法超越,以至人们不得不时时回到经典,这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进化论”者,在看待历史和现实的时候首先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透过这样的眼镜所看出来的“今天”是变质的今天,“传统”更是被歪曲的传统。这是在讨论传统文化时必须非常留意的。

2.3 传统文化不是一堆“知识”

“传统文化”指什么？有人一提到传统文化，就想到孔子、老子等诸子百家的一系列著作，想到经史子集那一大堆文献，想到书画艺术那一大堆作品，想到太极武术、世风民俗、饮食烹饪等一大堆礼仪、习惯和“功夫”，甚至想到汉服、八佾舞等。这些东西，甚至其中的每一样，都是需要花大量时间去学习的，有的甚至要花毕生的精力，每个学习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人都需要掌握这么一大堆东西，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而，真正要传承传播文化，我们还是要对“文化”是什么，以及我们要传承传播什么做出界定。

什么叫文化？这已是一个老问题。最普遍的说法是，文化有许多定义，但一般都分为三个方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对传统文化而言，精神文化方面，诸子百家的思想之外，还有文学、音乐、书法、绘画、戏剧等。制度文化方面，包括礼仪、法度、职官、科举、天文、历法、节日、风俗等。物质文化方面，包括各种器物、金石、鼎彝、陶瓷、丝麻、茶酒，以及建筑、园林等。我们同意这个说法，但有两点补充。第一，这三个方面一般是从横向去分的，看做三大范围、三大领域，但这三个方面还可以从纵向去看，看成从里到外的三个同心圆，精神文化在内圈，制度文化在中圈，物质文化在外圈。其间有个层次关系，在外面的都要以在里面的为依托：制度文化要依托精神文化，是精神文化的体现，而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外层表现。在传播和传承中，内层的东西比外层的东西处于更重要的地位。第二，如果同意这三者组成了三个同心圆，那么更进一步，同心圆必然有个共同的圆心，这是比内层精神文化还要本质的东西，它贯穿所有这些同心圆并且决定这些圆是“中国”文化而不是别的什么文化。这个

圆心就是价值观，是某个民族追求的最高目标，而在中国，它的体现就是“道”，因为只有这个“道”才能贯穿所有这些圆和所有这些层面。中国的精神文化讲“道”，诸子百家都在论“道”，书有“书道”，画有“画道”；中国的制度文化也讲“道”，治有“治道”，当官有“为官之道”，经商有“经商之道”；中国的物质文化也讲“道”，“茶道”、“酒道”，甚至庖丁解牛都有“道”。“道”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具有对内的一致性（各家各派、各行各业都以“道”为最高追求），对外的排他性（除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越南等以外，其他文化没有“道”的概念），是切切实实的中国文化最高的价值观。

确立“道”的概念有两个意义，一是为中国文化确立一个“心”，二是从“道”的价值观出发，避免把中国传统文化仅仅看做是一堆“知识”。“唯知识论”或知识崇拜是舶来品，是伴随欧洲近代和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思潮。随着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名言“Knowledge is power”（中国人误译成“知识就是力量”），从20世纪50年代起影响到中国。在唯知识论看来，一切都是知识，整个世界可以分解为各种各样的知识，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学科去加以分类，人们的任务就是要掌握这些知识，以此来为改造世界服务，而人们要学习的也是知识。在唯知识论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不管是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说到底就是一大堆“知识”；关于诸子百家的“知识”，关于中国文学的“知识”，关于科举制度的“知识”，关于某时代礼仪风俗的“知识”，关于园林构建或酿酒制茶的“知识”，等等。传承传播中国文化就是传承传播这些“知识”。然而这是不符合中国文化精神的。与唯知识论不同，中国传统崇尚的是“道器论”，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从道器论的角度看，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包括精神文化都只是“器”，而真正需要学习和传承的是

“道”。确立“道”的概念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懂得那些所谓的“知识”其实都是非常表面的东西，而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体现在其背后的“道”里的。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物质、制度、精神文化那些表象不可能不起变化，只有“道”是不变的。沉浸在“知识”里，就会一方面感到中国文化头绪繁多，学不胜学，一方面又感到很多东西学了也没有用。只有跳出“唯知识论”，才会致力于去追求传统文化的精神，而不会浮在表面望洋兴叹。

2.4 不能以儒学代替传统文化的全部

还有人一提到传统文化，就想到“儒学复苏”。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现在我们又到处大办“孔子学院”，这个弯转得太大，其间并没有经过很好的论证，以至于外国有人怀疑祭出孔子是一个政治因素，或者是搞什么“宗教输出”。而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值得思考的还有，过于突出孔子和儒学，对传承和传播中国文化是有利还是不利？仅仅孔子，仅仅儒学，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吗？

说到底，这还是儒家的“道统说”在起作用。“道统”这个词是朱熹提出来的^①，其来源则是孟子和韩愈。按照朱熹的说法，中国文化起源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以孔子为祖师，下传颜、曾，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其后就到了北宋的程颐、程颢兄弟，下面就轮到他自己。这个“道统”就体现在他所编注的《四书》里^②。700多年来所谓的道统就是这个道统。其实这只是儒家一家的道统，而且是相当狭窄的，因为即使就儒家而言，战国后儒分八派，这里只有两派或三派，重要的如荀子等都未能包括在内。

而各派儒家在继承前人的同时都加上了新的东西，有的与孔孟思想不一定相符^③。主张传统文化甚至“国学”就是儒学，实际上是认同了这一狭隘的观点。我们不接受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们认为传统文化首先是“道”，是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并不仅仅体现在儒家学说里，在其他各家的学说甚至各个层面的文化中都能体现出来。

中国文化有没有一个体系？有人说没有，我们认为有。如果只看到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具体的体现，那么，由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看起来就好像杂乱无章，没有一个严密的体系。但是，如果从中国文化的“精深”着眼，从前面讲的三个同心圆及其圆心的认识出发，中国文化自然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其他文化的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这三个同心圆的圆心——“道”。“道”的概念的建立和发展演变，就是中国文化的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用“道纪”一词来表达。

“道纪”一词是老子提出来的，他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道纪与道统的不同，在于道统是要用一家思想（就是南宋以来的儒学思想）来统率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整个历史，而道纪没有强调某一家某一派，只是强调要了解古代思想的起源（“能知古始”）和发展的脉络（“执古之道”），以此来指导今天的实践（“御今之有”）。这正是我们今天传承中国文化要提倡的思路和方法。

要理清“道纪”，首先要发掘中国思想的源头，在此基础上理清它的发展脉络。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就在于“轴心时代”，主要在于老、孔、《易》三家，其中《易传》

①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② 《论语》，孔子作；《大学》，孔子作，曾子注；《中庸》，子思作；《孟子》，孟子作。而四书的注是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作的。

③ 例如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就不是孔孟的原意。五四时期反对“封建礼教”，把这笔账算到孔孟头上是不公正的。

是孔子学习了老子思想后的产物,体现了老、孔思想的结合,最为完整精深,成了其后百家思想之源。以后的诸子百家包括各种文化领域背后的指导思想可说都是从这三家中生发出来的。而这三家本身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系统:孔子的形象是个积极入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愿意为理想而献身的志士;老子的形象是一个成熟、饱经沧桑、对世事有深邃的洞察力、处事稳健的世故老人;《周易》,特别是《周易·系辞》中的思想则是这两者的完满结合,既不乏积极的进取精神,又有深邃的洞察力,阴阳调和,圆润完美,可说是中华智慧的代表。从内容方面看,老子更多地讲“天道”,孔子更多地讲“人道”,而《周易》体现了“天人合一”之道。再打个比方,如果说早年的孔子代表“阳”、老子代表“阴”,则向老子学习后的晚年孔子找到了“中”或者说“阴阳调和”。“中”的思想在《论语》中已有体现,在《易传》和据说是孔子之孙子思作的《中庸》里则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以上这个认识有两个前提,也是我们对学术界两大论争的一个鲜明态度。第一,在《老子》作者的“春秋说”和“战国说”上,我们坚定地采用“春秋说”。第二,在《易经》“十翼”的“孔子作”和“非孔子作”上,我们坚定地支持“孔子作”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老子》全都是老子所作,或者《易传》等全为孔子所写。实际上,先秦经典几乎都是“层累地编成的”,特别是《老》、《论》、《易》的编成,可能都经历了几百年。但主体思想却应属于始倡者的,不能因为后人作过修订或补充就否定前人的始倡权。在我们这两个主张的背后,是对五四以后历史学界“疑古说”的否定。“疑古说”以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为代表,背后的理论支撑之一就是社会进化论,进化论者总不相信古人能做出比后人高的成就,因此凡有先后两说的一律从后不从先,稍有一点疑问的就全部否定。例

如否认从伏羲到尧舜禹的传说,否认有屈原这个人,否认老子是春秋时人,否认孔子作“十翼”等。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来自西方人提出的“中国文化外来论”的影响,对自己的东西没信心,认为什么东西在西方先出现是正常的,在中国先出现总要表示怀疑。疑古派的怀疑多数已被几十年来的考古成果所否定,现在已没有多少市场。

3. 如何传承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传承与传播中国文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热点,出现了许多形式。例如解读经典的百家讲坛、各地的申遗热、祭典热(从祭孔一直祭到黄帝、炎帝、仓颉甚至伏羲)、儿童读经热、国学热、经典重拍热、争夺名人故里热等,对外传播则有各种各样的中国文化课(气功、太极拳、烹饪、书法、二胡等)、中英文的中国文化概论教材、古典诗词英译热、《大中华文库》工程,以及正在酝酿的“五经”全译等。但是总的来说给人以“无序”之感。在传承和传播中国文化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3.1 传承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政府行为

上面提到的一些现象有个共同点,即都只是民间在“热”,作为担负着国家导向的政府却没有明确表态,更没有明确的政策。有的时候政府似乎有所作为,例如推动孔子学院的建立,但其意图并不明确:是想以此推动传播中国文化呢,还是只是为在海外的汉语教学机构“起一个名”?也就是说,“孔子”对于“孔子学院”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上到下都是不明确的。如果要以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对外进行宣传,那么更应该首先在国内做到这一点,我们总不能以为中华文化只是用来对外传播的,而国内就没有这样的任务吧?何况,对外传播如果没有对内弘扬作为基础,这个“传播”会让人感到莫名